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

师者 穆青

SHIZHE MUQING

穆青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系列研究

陈大斌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

师者 穆青

SHIZHE MUQING

穆青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系列研究

陈大斌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师者穆青/陈大斌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645-0194-5

I. ①师… II. ①陈… III. ①穆青(1921~2003)-生平事迹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8362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40号

邮政编码:450052

出版人:王 锋

发行部电话:0371-6696607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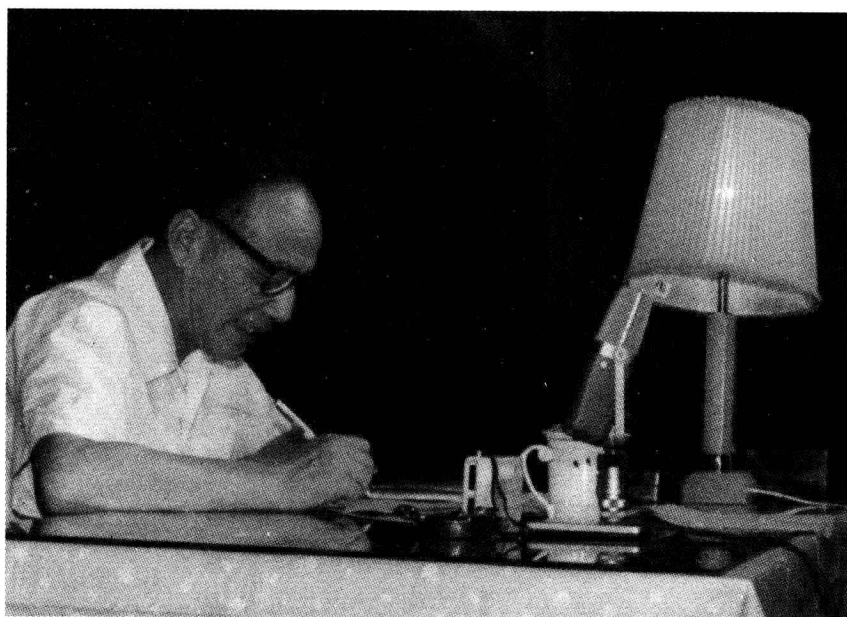
字数:261千字

版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0194-5 定价:5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穆青在办公室写作

内容提要

穆青是我国当代新闻战线的一面旗帜,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上多有建树。本书作者是新华社一位资深记者,在穆青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与穆青有较深的思想交流和业务合作。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穆青的新闻实践,告诉我们穆青的许多影响广泛的作品是怎样采写出来的。

本书是一部“亲历者说”。作者具有较好的理论修养和文字功底。文风朴实,语言洗练、生动,全书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叙事抒情,读来令人信服,也会让人感动。本书不仅再现了穆青这位令人敬仰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光辉形象,而且提供了农村改革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还写出一名优秀记者的成长经历和经验,是一本思想性、可读性都很强的好书。

师者穆青

目 录

001\ 引言

007\ 一、社会实践,记者成长的第一课堂 ——穆青引导我走上记者之路

008/ 太行山里的“启蒙”

022/ 一堂采访写作实习课

031/ 大寨“蹲点”的酸甜苦辣

041/ 卷进“批林批孔”的漩涡

058/ 一次终生难忘的谈话

064/ 辉县这个典型与昔阳有什么不同?

074/ 穆青与郑永和为何心心相印(上)

083/ 穆青与郑永和为何心心相印(下)

092/ “首席记者”风采

120\ 二、农村改革报道,我们共同走过风雨

121\ 走上“农村组长”的岗位

128\ 走好“农村组长”的最初几步

135\ “十字路口”的抉择

147\ 农村报道与“农业学大寨”运动拉开距离

159\ 抓住安徽、四川两个典型做大文章

167\ 借好中央两个文件的强劲“东风”

177\ 农田建设不能再这样“大干”下去了!

186\ 深入批“左”,是宣传好三中全会《决定》的关键

199\ 积极推动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发展

236\ 三、创办新闻周刊,一项开创性实践

——创办《瞭望》周刊的实践与探索

239\ 新华社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245\ 月刊及“中南海纪事”专栏的策划

252\ 《瞭望》发展要实现“三级跳”

258\ 探索周刊规律,发挥周刊优势

265\ 探索周刊规律要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272\ 周刊要创造有特色的名牌专栏

278\ 周刊要更贴近实际,更多地报道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

284\ 办好刊物,不断提高质量是编辑部的中心任务

引 言

我是1971年秋天调进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开始做新闻采编工作的。此前,我从未做过新闻工作,也从未见过穆青。

我进新华社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期。我到国内部时,穆青已经“解放”出来,但还没有正常工作,一年后才恢复新华社总社和国内部的领导职务。我与他第一次当面交谈缘于一次采访。这是我与他30多年交往的开始。当时我只是一个立志要当好农村记者的新兵,与他的谈话是听得多说得少。向他表达的也就是希望有机会多下乡采访,并准备长期从事农村报道等这样的心愿。穆青重视农村新闻报道,尤其对农村先进人物典型报道情有独钟。他也非常支持有志于农村报道的记者上山下乡。当他知道了我的想法之后很高兴,表示支持我。他说:“不怕吃苦,上山下乡,这是一个值得鼓励的宏大志向。”并对我说,他自己也非常喜欢农村报道。他还说,中国农村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百科全书,值得花毕生精力来研读!做一个农村记者真的是天地广阔、大有可为!

他的支持,不是口头上的,很快便由国内部和农村组安排我上山下乡,先后去大寨所在的山西省昔阳县、河南省辉县等地农村“蹲点”,在农村里连续住了三年多时间。通过“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农民和基层干部为师,在实践中深入了解、认识当代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为

我做农村报道打下根基。粉碎“四人帮”之后，他支持我先后走上新华社农村组和国内部的领导岗位，担负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报道的组织工作。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在这难忘的几年间，穆青一方面鼓励我大胆实践，同时又通过一项项工作实践，教我如何做好新闻报道的组织工作。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注入了他的真情和心血。

2003年10月11日，我们崇敬的师长穆青离我们而去，我心中的悲痛、怀念之情如潮水汹涌。在八宝山那肃穆的灵堂里，穆青躺在鲜花丛中安详地熟睡了。我再也无法听到他的教诲了！而正面墙上，那张照片上的穆青，仍然微笑着，注视着我和来为他送别的人们。我站在他的面前，看着他那双慈蔼的眼睛，多年来的件件往事涌上心头。每次向他汇报工作，或倾诉心曲，他都是这样看着我，那眼神是慈祥的，对我们充满了关爱和鼓励。而每看到他这样真诚的眼神，我都会感到心暖，受到鼓舞，会在心上对自己说，好好干吧，你是幸运的，遇上了穆老头儿这样的好领导、好老师！

那天，从灵堂里走出来，穆青那慈蔼的笑容、关爱的眼神一直在我眼前浮现，许多真诚教诲的话语反复在耳畔响起。这天夜间我辗转无眠，直到又一个黎明到来。穆青逝世后的几天里，我一直想写点悼念文章，但满心的话不知从哪里说起！几次执笔终难成篇。而就在送别良师的这个无眠的长夜，30多年来，特别是农村改革前后10年风雨岁月中与他交往的许多往事，甚至连那一次次重要谈话，我都细细回顾了一遍。我似乎猛然间对这些看似平常的往事有了新的认识，或者说是一种省悟。穆青与人谈话少有虚套，也从不背后议论别人，不谈鸡毛蒜皮的琐事。在研究报道、分析农村形势及一次次修改稿件的过程中，他的许多谈话都涉及做人与做事，读书与实践，才干学识的养成与作风的自律等等这些记者成长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他的许多见解独到深刻。又因为是与我的私下交谈，所以都是有感而发，因事而言，意有所指，表述得更加自然，直截了当，观点鲜明，评人论事，入木三分。有些话我未见他在其他场合讲过。在对

工作上、人与人关系方面一些事情的处理上,他的态度和方法也给我深深的启示。我想,这些为人处世之道,都是前辈们用多年实践换来的经验,我不可独受,应当与更多的人分享。当时,我也曾把其中的一些向周围的人转述过。其实,这些往事的意义都远远超出了我与他个人交往的范围。想到这里,我终于有了决断:就写我所认识的穆青,把他引领我走上新闻之路及后来担任农村组组长过程中那些对我教诲最深、让我终生难忘的事都写出来,写出一个后来者对引路人、学生对师长的回忆;写他引领我们求索中国农村问题的个中苦乐。这不仅是对师者穆青的深切怀念,对于有志于做好记者的人,也会有所启发。

但是,当汇集起资料,经过一番梳理,列出提纲之后,我又迟疑起来。这样写来固然比较系统地讲述了我所认识的穆青,但就这样写这些极平常的事,行吗?对同样一件事,各人的感受可能很不相同,我念念难忘的,别人可能会认为那都是些末节琐事,体现不了穆青这样一位新闻界巨擘的思想境界。但是,再反过来想想,对穆青人生的整体评价,那应当是组织上的事,这方面的文字(包括领导机关发出的向他学习的决定等)已经有了不少。对于一个领导干部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要求,党和国家有关部门都有明确的规定,平时政绩的考核、功过是非的评判、过世后的“盖棺论定”,都有一定的标准。这些都是不用我等多说的。作为我个人的怀念文章,当然只能写我自己的所知所感,哪怕真的有些琐碎。我正是从这些细微之处了解、认识穆青其人的。其实,穆青对一个后来者的关怀、教诲,恐怕也很难说都是“琐事”,也难以完全归于他与我个人间的“私谊”。在新华社内,像我一样受到穆青真挚关爱、帮助的编辑、记者可谓多多。再退一步说,就算我所述及的都是琐碎细节,恐怕正是对许多以讲原则话为主调的大块文章的必要补充,有何不可呢!

穆青是一位有着强烈事业心、责任感的领导干部。他的事业心、责任感不仅表现在全身心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做好新华社的领导工作上;

也不仅表现在他身体力行当好新华社的“首席记者”，一直手不停笔，写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一方面；同样也表现在他对新华社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的关切上。他把带领所有部属共同前进，为新华社的事业培育更多的人才，作为自己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新华社内，穆青爱才、关心培养人才是有口皆碑的。不管是战争年代投身新闻事业的老一辈，还是建国后逐年进社的大专学生，甚至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掺沙子”调进来的军队转业人员，只要热爱新闻事业，有志于采编业务，穆青都一视同仁，一样给予鼓励帮助。个别在“文化大革命”中做过一些错事的人，只要认了错，他都既往不咎，都因材施教，该出国的仍然派出国，该使用的照样委以适当的工作，使有能力愿干工作的人都各得其所，不同类型的人都可以在新华社各个部门里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所以，有人说，穆青爱惜人才，用人“不问来历”，肯干就好；培养干部“有教无类”，多多益善。

穆青的办公室和家里的门，随时都向编辑、记者们敞开。你要向他讲述在基层采访中发现的问题及情况，你要请教采访、写作中遇到的问题，甚至向他倾诉个人生活、工作中的委屈，他都笑脸相迎。耐心地倾听之后，他会尽可能地给你一些真诚的指点。他把帮助青年成长当成自己的职责，把新华社当成一所培养人才的学校，随时随地在做。他帮助别人从来不以教导者自居，从不居高临下地训斥，少有喋喋不休的说教。他以自己的真诚面对众人，以他的平等态度与所有的部属以及不少慕名而来的全国各地各种媒体不同年龄的新闻工作者相与相处。他总是鼓励大家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认为“深入实际、心系人民”是做好记者的根本，是青年新闻工作者成才的必由之路。这是他一生实践经验的总结。他愿意把自己的这条经验传授给后人。

“深入实际，心系人民”这是穆青的座右铭，也是他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诲。在他的影响感召之下，新华社全社上下形成良好的风气，以争名利

地位为耻,干好工作、写出好稿子为荣!编辑、记者们人人争相“往下跑”,争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争着向艰苦地区跑。不辞劳苦去抓“大老虎”,逮“活鱼”,千方百计去发现、报道生活中的新鲜事物、重大新闻。在这种环境里,新华社人才辈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编辑、记者成长起来,一篇篇新闻精品创作出来,广为传播,对全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这固然是新华社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但其中有穆青的一份贡献。在新华社里,他是众多编辑、记者心中的良师。他的言传身教,影响着新华社老老少少几代人。这是穆青对新华社,乃至对中国新闻界的一个贡献。一些建国后大学毕业进入新华社成长为中层业务骨干的同志说,我们这一代人,无人不受到穆老头儿的关怀和培养;还有人说,我们是在他耳提面命的教诲下成长起来的。这些都是真心话。这也是穆青最让我崇敬、最让我难忘的地方。我想,我的怀念文章,不写他作为新华社社长在工作上的贡献,也不多写他作为新华社“首席记者”的丰硕成果,我着重写作为良师的穆青,写他对后来人的真诚关爱和培养。这不同样是有意义的吗?

穆青是我们多年的老领导,但我更愿意说他是我辈的良师,我更愿意称自己是他的学生,尽管算不上一个优秀学生。我觉得,在我们这样一个新闻、文化或学术单位里,一任领导,树立起威信,让人服从,固然不易,但真正以自己的道德、文章让其部属敬佩,在心上尊他为良师益友,则更难。像穆青这样,生前能让一大批部属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干,把他当做榜样来学习、追随,逝后仍然作为师辈来尊崇,那是很不容易的。多年来工作实践的观察,使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穆青对新华社农村新闻报道的领导力及影响力的发挥,一方面靠社长的职权发号施令进行指挥,另一方面靠他与农村记者间的亦师亦友亲密关系的影响力,靠身体力行“首席记者”的职责所产生的带动作用。二者相比较,后者的力量绝不比他新华社社长身份所发挥的领导作用小。在我看来,反而可能更大、更有实效。推而广之,在一切知识分子为主的文化事业单位里,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的最高境

界应当是共同工作,平等相处,亦师亦友,是上下级,又是可以共同探讨问题的同道,下属对领导人无畏惧之心且有信赖之情。我坚信,领导人的文化思想修养、人格魅力及实干行动的影响、带动作用,要比一般的行政命令更为有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穆青为文化新闻事业单位的领导者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这样的人,比那些官气十足的人,更应当受到社会、舆论的尊崇。

穆青是我崇敬的师长。我的整个新闻实践,特别是农村新闻采编实践,是在穆青的关怀、帮助下,历经坎坷曲折的道路走过来的。人生苦短,而人间情长。生前,我尊敬他;逝后,我怀念他。尊敬、怀念之情和着我的心血和热泪,化成这一段段文字。纸短情长,我把它当成一个小小的花环,献予我敬我爱的师长的在天之灵。

一、社会实践,记者成长的第一课堂

——穆青引导我走上记者之路

进新华社时,我已过“而立”之年。走进一个新的行当,一切要从头学起,当然困难很多。所幸的是,我进了新华社不久,就因工作关系认识了穆青这样德高望重的新闻前辈,并得到他的关爱和指教。每个人的人生之路上,是绝少不了别人帮助的,尤其是在关键时刻,若能遇到良师的指点,就会少走许多弯路。穆青与我素昧平生。当时我只是一个业务上毫无建树,除了怀有一腔做一个农村记者的热情之外,一无所长的青年人;而穆青当时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我们在一次采访中偶然相识之后,他就如一位慈蔼的长者,敞开胸怀,坦诚待我,为我指点迷津,成为我新闻工作的真正的蒙师。我是在他的引领下,开始在新闻工作的岗位上学步的。他的言传身教对我此后30年的新闻实践,乃至我后半生的人生之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起步就开始认识穆青,并在他的直接领导、关怀下工作,这是我此生之一大幸。

穆青对我最初的教导中最突出之处是:记者是在社会实践的风雨中成长的,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真正了解实际,是记者的基本功,最好的办法是较长时间下基层“蹲点”。

太行山里的“启蒙”

1972年7月,在大寨、昔阳的采访中,我与穆青初次相识。在昔阳县城南大河滩上的一块玉米地头,他以我们当时在昔阳、大寨的采访实践为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言简意赅地对我提出的“什么是新闻”等问题作了回答,并明确指出社会实践才是新闻工作者最好的学校。这是我接受新闻工作的启蒙第一课。

其实,在昔阳,他还对我进行了另外一种极重要的“启蒙”:他对当时正席卷全国农村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当时被尊为农业圣地的大寨和全国第一个“大寨县”的山西省昔阳县,在运动中的一些做法,表示出某种疑虑,他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示出来的。可惜由于我太粗心,更由于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当时我没有听懂他的“话外之音”,可谓蒙昧未开。直到两年之后,他带我到河南辉县继续“蹲点”时,他用更明确的语言又一次对我说出他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忧虑。这时我才明白,穆青虽然刚刚离开“牛棚”,却早已开始在深沉地思索着中国农村、农业的出路,关注着亿万中国农民的命运。在他的引领下,我开始学习着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冷静地观察“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农村形势,思考关乎中国命运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这才是穆青对我这个刚开始起步的农村记者最重要的“启蒙”。后来,我之所以能在农村改革的报道中发挥一点作用,与较早就对这一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的有所思考,并逐步形成正确的认识有直接

关系。

所以，我常说，我新闻工作的第一步是从太行山里走出的。

未见到穆青之前，便知道了他的名字。知道穆青并使我对他产生景仰之情的，是他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时，我听了广播，看了刊登在报纸上的通讯稿，还在中宣部的礼堂里听了穆青讲焦裕禄事迹的报告录音。虽未见其人，但他的那篇通讯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激动的热泪一次次涌流。

这篇通讯带给我的另一个震撼是新闻作品的巨大感染力量。我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专业，也曾发表过几篇小说、散文之类的习作，青年时代一直做着多年不醒的“作家梦”，不大明了新闻工作和新闻作品的价值。这篇通讯使我改变了中文系学生中那种“唯有文学高”的浮浅偏见。一篇通讯竟能如此强烈地感动全国上下！一篇成功的新闻作品会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量！由此我萌生过转行去做新闻记者的念头。但在那个时候，干什么事都是组织决定的。个人，尤其是一个毫无建树的青年人，简直没有自己选择的可能。当记者也只能是在心上想想罢了，连说出来的勇气都没有。但它在我心灵深处的影响却是抹不掉的。我憧憬着记者的职业，我崇敬穆青这样为人民、为时代立言的记者。这些对我进入新华社之后的工作及与穆青的关系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1971年秋天，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机会，使我走进了新华社的记者队伍。新华社到我所在的“五七干校”选调一批中外文业务干部，我有幸成为被选中的一员。

来到新华总社国内部后，我被分配到农村新闻编辑组做采编工作。当时，新华社“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夺权打派仗的混乱阶段已过去，正处于军管时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新华社老领导和一大批

业务骨干人员,已度过被残酷批斗的阶段。一些人被送至设在山西省永济县盐碱滩上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也有一些留在总社“监督劳动”。穆青被反复批斗之后留在总社,先在建筑工地和职工大食堂干活,后到国内部工业编辑组做一般编辑工作。我到新华社后,便打听心仪已久的穆青在哪里。农村组一位青年同事领着我悄悄来到国内部工业新闻编辑组一间办公室的门旁,指着室内一位正埋头工作的人悄声对我说,这老头儿就是穆青。我初来乍到,未敢造次,看了一眼便悄悄退了回来。好在穆青也正襟危坐于案前,专注地处理稿件,并未发觉门外走廊里有两个家伙探头探脑窥视他。

当时,穆青也就是五十来岁,可看上去面相偏老,头发花白稀疏,白净的脸上已是皱纹密布、沟壑纵横。穿着也不讲究,上身一件灰布中山装已经很旧了,手臂上还套着一副蓝色旧布改做的“套袖”。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穆青。

之后,虽然每天都同在新华社那座十层办公大楼的第五层上下班,但一直没有机缘相识。

第二年,新华社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军管结束,朱穆之等一批老领导先后从“五七干校”回到新华总社社部领导岗位。穆青也离开了工业组,出任新华总社副社长、总编辑,虽然还兼着国内部主任,但不在五层楼里工业组上班了,我就更没有机会与他相识了。

我真正与穆青相识是在采访第一线,在山西省昔阳县。可以说,在太行山中的昔阳,我接受了穆青新闻工作开蒙的第一课。

我这样说,绝非牵强附势。我没有学过新闻专业,进新华社后也没有接受正式业务培训。此时虽已过而立之年,却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新闻新兵。进社时“政治挂帅”之风正炽,业务培训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总社军代表及党委用一周时间对我们进行“入社教育”,主要是政治思想方面的教育,讲新华社的性质、职能及革命传统、工作纪律等。业务学习内容只有